

国家与社会视域下的民国北平卫生运动大会研究

宋永林

(聊城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59)

摘要:民国时期,北平公共卫生事业缓慢向前发展。1934-1937年,在清洁运动的基础上,北平市政府共组织举行了四次卫生运动大会。期间,政府及相关卫生行政机构通过与各类社会团体密切合作,开展卫生展览、舆论宣传、儿童健美比赛、清洁扫除、预防注射等丰富多样的活动,动员广大民众积极参与。卫生运动大会的举办,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民众的卫生意识,改善了城市环境条件,促进了公共卫生的现代转型,而且透视出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多层次面相,体现了国家权力对社会事务和民众日常生活的渗透和控制。

关键词:民国时期;国家与社会;北平;公共卫生;卫生运动大会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217(2024)05-0043-06

收稿日期: 2024-07-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214):中国近代科学社团资料的整理、研究及数据库建设。

作者简介: 宋永林(1993-),男,山东冠县人,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4.05.014

民国时期,公共卫生问题日益受到政府和社会精英阶层的重视。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遏制疫病流行,改善城市生活环境,提高民众的卫生意识,开始在全国各地推行以“大扫除”为主题的卫生清洁运动。在此期间,北平举办了多次卫生运动大会,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本文聚焦于1934-1937年北平卫生运动大会,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出发,探讨卫生运动大会的背景、举措及影响,透视民国北平公共卫生建设的历史进程。

一、国家力量:卫生运动大会的推行

公共卫生作为一种社会性事业,一直以来就与国家的发展密不可分,蕴含着浓厚的社会治理特征。具体表现在政府通过努力优化各项规章制度,向民众宣传正确的生活习惯和卫生知识,并积极预防和治疗流行性疾病,以改善整个社会的环境条件。民国时期北平历次卫生运动大会,离不开国家力量的介入,是在政府的组织下而举办的。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设北平特别市,以卫生局统一管理全市卫生事项。1930年,因财政紧张,北平市政府裁撤卫生局,在公安局下设卫生科,1932年又缩编为卫生股。1933年,北平市政府为重新整顿卫生行政,成立卫生处,并于1934年升格为卫生局,直至抗战全面爆发。虽然北平卫生行政部门几经更调,但是总体来看仍缓慢向前发展,主要体现在附属医院、诊疗所、疗养院、讲习所、陈列所等机构不断增多,颁布的卫生法规逐步完善,卫生行政工作范畴日益明确,基层卫生组织也开始建立起来。自1928年始,北平先后建立四个卫生区事务所,作为推行公共卫生服务的基层组织。北平公共卫生行政体系的初步确立,为实施卫生运动提供了制度保障。

民国时期的卫生运动是一场由上而下推行的全国性群众运动。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污物扫除条例》和《卫生运动大会施行大纲》,要求地方政府联合各社会团体和民众,于每年5月15日及12月15日各举办大扫除一次,同时作为卫生运动大会之期。北平市政府成立之初,便认识到城市环境问题突出,“清洁卫生关系重要”,若不进行整治必会“发生传疫媒介,妨害公共卫生”。^①1928年12月5日,北平市政府

^①《北平特别市卫生局布告》,《市政公报》1928年第2期,第306-308页。

函致各机关、学校、团体参加 15 日举行的清洁运动大会，“藉以表现注重公共卫生之新精神”。^① 12 月 15 日，清洁运动大会在天安门前举行开幕式，参加团体百余个，共计五万余人，进行游行清洁街道。1929 年 6 月 16 日至 19 日，北平再次举办清洁运动大会，参加人数共计三万余人，除了沿街游行，还在中山图书馆、中山公园举行了卫生展览会和卫生游艺会。北平市政府积极组织清洁运动大会，主要目的在于“唤起民众的卫生精神，养成民众的清洁习惯”。^② 正如北平卫生局局长黄子方在讲演中指出：“希望以后要唤起民众，一致联合起来，去实行清洁卫生”。^③ 清洁运动大会的举办，为后来的卫生运动大会提供了经验，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卫生观念在社会上的传播。

总体来看，在大规模的卫生运动推行之前，北平市政府一直有意加强城市卫生治理，但效果并不十分显著。1932 年曾有报刊载文，指出北平环境虽稍有改善，但大多数普通民众仍“在粪窖中求生活”，城市道路依旧是“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的状态。^④ 由于财力支绌，北平卫生行政部门无力扩充清道夫来解决城市内部的卫生问题，也缺乏专业人员指导社会团体进行自治。这种情况直至 1933 年卫生处成立后才有所改观。卫生处一方面对卫生行政人员进行甄别选用，革除“年老识陋”者，招募新人；另一方面，简派人员赴南京接受训练，使其熟知卫生稽查技能，以造就“具有卫生常识之完备人才”。^⑤ 卫生处特别强调开展卫生教育，认为必须引起民众对于卫生的兴趣，并联合各行各业及社会团体“关注卫生学理，使其分途推进”，如此“始能有效”。^⑥ 北平市政府极力鼓动社会各阶层投身卫生事业，不仅是为了改善城市卫生状况，减少疫病的发生，而且试图使民众和社会团体进一步协助政府办事，强化卫生行政，推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值得注意的是，卫生运动大会既是北平市政府以国家权力积极促成的结果，也与新生活运动的开展密切相关。1934 年 2 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从“衣、食、住、行”等为起点，围绕“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六项具体标准，对国民生活进行改造。新生活运动强调养成讲卫生的生活习惯，进行清洁运动和大扫除，其“清洁”标准成为北平卫生运动大会产生的一个重要催化剂。1934-1937 年，每年 5 月，北平都举办卫生运动大会，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共举办了四次。1934 年，北平市政府鉴于“过去每年举行清洁扫除大会，除开会讲演外，所得实效甚微”，所以决定将第一次卫生运动大会扩大举行，会期持续 8 天，成为定例并延续下来。^⑦ 民国市政问题学者殷体扬也指出，以往举办的清洁运动多“重在形式方面，各机关派员凑一凑热闹，游一游高路，就算了事”，效果不尽如人意，而此次卫生运动大会“范围实质，都扩大充实”，一方面联合各方力量共同合作，另一方面要“给一般市民一个有系统的整个卫生知识”。^⑧

为扩大影响范围，尽量覆盖各个区域，北平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组织和领导。第一次卫生运动大会时，北平全市分为东（灯市口公理会）、西（缸瓦市福音堂）、南（珠市口福音堂）、北（地安门外民众教育馆）四区，以中山公园为总集中地点。从第二次卫生运动大会开始，取消北区，东、西、南三区分别由第一、第二卫生区事务所及市立医院负责。同时，大会下设总务组、讲演组、展览组、表演组、宣传组、儿童健美比赛组、清洁组、预防组、交际组等，分别负责布置会场、讲演、展览、宣传、清洁、预防注射、接洽招待等各项活动，保证了卫生运动大会的有序进行。

二、民众参与：卫生运动大会的举措

从目标上看，卫生运动大会与之前的清洁运动大会具有一致性，即“给一般民众灌输一些卫生知识，告

①《函各机关、各学校、各团体请参加十二月十五日清洁运动大会》，《卫生公报》1928 年第 1 期，第 160 页。

②《清洁运动大会纪录》，《卫生公报》1928 年第 1 期，第 265 页。

③《平市大规模之卫生清洁运动》，《中央日报》1929 年 6 月 25 日，第 1 版。

④伯：《市政与卫生》，《北平晨报》1931 年 7 月 10 日，第 6 版。

⑤方颐积：《北平市卫生行政现在及将来》，北平市政府卫生处编：《北平市政府卫生处业务报告》，1934 年，第 161 页。

⑥孟威：《本市卫生处成立感言》，《市政评论》1934 年第 1 期，第 76-78 页。

⑦《平卫生运动大会决扩大进行期收实效》，《大公报》1934 年 4 月 17 日，第 4 版。

⑧殷体扬：《北平市第一次卫生运动大会之认识》，《市政评论》1934 年第 1 期，第 104-106 页。

诉大家公共卫生的重要,希望人人都有一个整个的认识”^①。为此,北平市政府开展了卫生展览、舆论宣传、儿童健美比赛、清洁扫除、预防注射等丰富多样的活动。

(一) 卫生展览

卫生展览主要设在中山公园、卫生陈列所、民众教育馆等公共场所,陈列品共分为八类。一是生理及病理展览,陈列人体各组织、各病症之标本、模型及医用仪器;二是环境卫生展览,陈列各种管理环境卫生的器具、模型;三是卫生习惯展览,陈列符合及不符合卫生要求的生活状况模型、图表;四是营养食物展览,陈列与营养有关的各种食物及制造方法;五是妇婴卫生展览,陈列妇产及婴儿卫生之标本、模型及照片;六是饮食料制造与卫生展览,陈列酱油、汽水、牛乳等饮食品制造程序之模型;七是通俗卫生图画展览,陈列北平市中小学学生所作卫生常识、生理解剖、营养卫生等图画;八是卫生局工作展览,陈列卫生局及附属机构之工作照片及成绩统计图表。

五花八门的陈列品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极具吸引力,往观者络绎不绝。1934年5月13日,《益世报》记者参观卫生展览,描述当时中山公园“车水马龙,熙来攘往”,十分热闹。^②1937年第四次卫生运动大会,仅5月17日一天参观卫生展览的市民就达两万人以上,“竟日拥挤不动”。^③卫生展览的举办,使广大民众更为直观地认识到日常卫生的各个方面,能够“有一种具体的观念”。^④

(二) 舆论宣传

北平市政府十分重视利用报刊、广播等舆论工具,向各阶层民众传递生活卫生常识和建设公共卫生的意义。从1935年起,《卫生月刊》开始出版《卫生运动大会专号》,刊登各种公共卫生论著。1935年《卫生月刊·第二次卫生运动大会专号》刊登《论公共卫生》《努力公共卫生以复兴民族》《怎样促进卫生事业》《病是怎么来的》《婴儿及孩童时代疾病之预防》等19种论著。1936年《卫生月刊·第三届卫生运动大会专号》刊登《环境卫生之重要性》《健康的意义》《卫生为民族生存之要素》《卫生运动大会与全体市民的关系》《家庭卫生》等19种论著。

总体来看,这些在报刊上登载的论著,主要面向知识分子群体,主题侧重宏观层面,将卫生问题与国家民族发展命途紧密结合,以凸显推行卫生运动大会及公共卫生建设的必要性。相对而言,广播讲演的内容更多地关注具体的卫生常识和传染病防治方法,通俗易懂,便于文化程度较低的民众理解。如1935年第二次卫生运动大会期间,河北、北平电台广播卫生局、市立医院、传染病医院等卫生机构专业人员的讲演,涉及肺病、伤寒、狂犬病、花柳病等常见的传染病防治及生活卫生知识。

(三) 儿童健美比赛

河北电台在广播《卫生运动大会的意义》时,指出儿童是“国家的基础”和“国家未来的主人”,他们的健康与国家盛衰密切相关。举办儿童健美比赛,就是“要借此机会劝导一般作父母的注意婴儿卫生”,这也是“强国强种的根本办法”。^⑤

儿童健美比赛在历次卫生运动大会中都属于“特繁”工作,但考虑到儿童健康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北平市政府在报名程序、评判标准、奖品征集等方面“莫不经严密的规定”,以期完备妥善。参赛儿童按照年龄进行分组,再由卫生机构专业人员检查体格是否及格,凡有明显营养欠缺、肤色苍白、皮肤病、咳嗽流涕、软骨病、背脊弯曲等症状者均不得参加比赛。按照评判标准,1936年第三次卫生运动大会时,共有儿童574人报名,但接受检查者为467人,其中及格者277人。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到,当时儿童身体健康状况普遍不佳,普及妇婴卫生知识仍具有相当大的急迫性和艰巨性。对于检查及格的儿童,发给比赛证,主要通过测量儿童的体重、身高、牙齿、动作、性情、整洁等情况,判定分数,核算后确定最终名次。在比赛

①《北平育英广播电台卫生讲演卫生运动大会的意义》,《大公报》1934年5月22日,第11版。

②《北平市卫生运动大会参观记》,《天津益世报》1934年5月15日,第10版。

③《卫生运动大会第二日各区展览观者拥挤》,《华北日报》1937年5月17日,第6版。

④《北平育英广播电台卫生讲演卫生运动大会的意义》,《大公报》1934年5月22日,第11版。

⑤《北平育英广播电台卫生讲演卫生运动大会的意义》,《大公报》1934年5月22日,第11版。

期间，为“灌输民众育婴常识起见”，还专门刊印儿童卫生知识的小册子，散发给儿童家长和观众。^①

（四）预防注射

开展预防注射，是北平市卫生工作中经常举行的一项群体性活动。1932-1933年，全市预防传染病注射人数分别为14701人、76470人，其中接种天花疫苗人数最多，达到9595人、37870人。^②卫生运动大会期间，北平市政府将种痘作为预防注射工作的重心，以期进一步防治天花。为扩大北平市种痘覆盖面，对于边远郊区及不了解种痘知识的普通民众，特编排戏剧进行表演，“寓教于乐”，积极引导，“冀使观剧民众，于兴高采烈之中，得知种痘之意义”。^{③④}同时，在中山公园及各区分会场，均分别指派医师或护士，一律免费施种牛痘，并办理各会场的救护适宜。

1935年，北平市政府通过了由卫生局呈送的《管理人民种痘暂行规则》，规定天花患者家属及接触者一概种痘，婴幼儿于出生6个月内、6至7岁时要进行种痘。卫生运动大会为种痘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一个契机，北平市政府特别强调要借大会解释此项规则，“俾使执行强迫种痘”。^④此外，为加大宣传力度，大会还制定预防传染病的标语及说明，内容简短醒目，如“怕得时疫，最好是打预防针”等。^⑤

（五）清洁扫除

其一，清洁街巷。卫生运动大会承袭了以往清洁运动的内容，继续实行大扫除工作，清理街巷积秽。1935年4月1日至6月30日，接连举行大扫除，抽调夫役12名每日掘土，并用大车多辆运输积秽。1937年，北平卫生局要求在大扫除之前，全市住户、商铺、工厂等将尘秽打扫干净，不仅规定了详细的清洁标准，而且派遣稽查员进行抽检，自6月1日起连续检查三天。

其二，捕蝇运动。1936年第三次卫生运动大会时，北平卫生局发布通告，将5月30日定为“灭蝇日”，动员各市民、铺户、机关、学校、团体等开展灭蝇。在北平当局看来，“本市学校林立，冠于全国，且学校既为教育总枢，所以防蝇事宜，应以学校为中心”。^⑥因此，在这次灭蝇运动中，中小学生成为主力军，共有211所学校参加，捕蝇总数达到1719665个。^⑦

三、互动成效：卫生运动大会的影响

从客观来讲，无论是卫生运动大会的制度设计，还是具体的实施举措，北平市政府及卫生行政部门扮演着主导者角色。国家层面有意识地动员民众广泛参与，加强彼此之间的互动合作。1934年北平市长袁良在第一次卫生运动大会开幕演说中，指出举办卫生运动大会的目的，“就是要唤起民众与政府合作，能够官民一致的来办理卫生事业”。^⑧在这一过程中，学会、商会、慈善机构等各类民间团体发挥了中介作用，成为沟通国家与社会的桥梁，既是政府的协力者，也是卫生运动的参与者。1934年第一次卫生运动大会筹备会，除北平市卫生处外，共有妇女协会、基督教男女青年会、民众教育馆、市立医院、自治监理处等十余个团体参加，“以期分工合作，组织严密”。在经费筹集上，北平市政府补助一部分，其余则由市内卫生机关及与卫生有关之团体予以协助。^⑨在政府、民间团体和民众的共同参与下，北平卫生运动大会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首先，城市环境卫生状况有所改观，公共卫生事业逐步向现代转型。长期以来，北平城市清洁工作不

①《儿童健美比赛》，《卫生月刊·第三届卫生运动大会专号》1936年第5、6期合刊，第11页。

②《北平市预防传染病注射人数比较图》，北平市政府秘书处编：《北平市政府二十二年度行政统计》，1935年，第113页。

③《预防工作实施办法》，《卫生月刊·第二次卫生运动大会专号》1935年第8、9期合刊，第9页。

④《北平市第三届卫生运动大会展览室规则及参展人数统计》（1936年），档案号：J5-1-135，北京市档案馆藏。

⑤《北平市卫生运动大会防蝇办法》，《社会周刊》1934年第79期，第1-3页。

⑥《灭蝇运动》，《卫生月刊·第三届卫生运动大会专号》1936年第5、6期合刊，第18-21页。

⑦ 苏病：《北平市第一次卫生运动大会袁市长演说词摘要》，《大公报》1934年5月22日，第11版。

⑧《平卫生运动大会决扩大进行期收实效》，《大公报》1934年4月17日，第4版。

到位,道路上“污秽载途,便溺任意……炉滓积果成阜,公厕秽气四溢”^①,十分影响城市形象。卫生运动大会期间,北平市政府集中力量对街道、沟渠、公厕等进行清洁,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市的环境卫生状况。1936年第三次卫生运动大会清洁抽查饮食店铺、沟口秽池、各区住户、各理发店、公厕尿池、公共浴室等公共场所共904处,其中清洁者居半数以上,公厕尿池等秽物聚集地均撒有石灰,结果较为良好。^②卫生运动大会推动了传染病预防工作的深入,仅1935年4、5月,全市种痘者达九万余人。^③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北平市死亡率逐步降低。1935年,全市每千人中出生为17人,死亡为14人,这一数据相较以往每千人中死亡在15至20人之间,且死亡均多于出生的情况,已有了明显的优化。^④卫生行政、环境卫生、传染病预防、妇幼保健等多个方面的协同推进,促进了北平公共卫生事业的现代转型。

其次,进一步普及了卫生常识,加深了社会各阶层的民族意识。卫生运动大会期间,北平市政府利用报刊、广播等媒介,采取表演、展览、标语等形式多样的手段,向各阶层民众灌输卫生知识,传递洁净的生活习惯。1935年第二次卫生运动大会之卫生展览,市民十分踊跃,八日内共有71420人参观,“各界人士均盼延期展览”;闭幕式时,“参加市民颇为拥挤”,东四十二条小学表演的“捕蝇运动”、燕京地毯厂表演的“迷信不能治病”等短剧,生动有趣,使参观者在轻松的氛围中潜移默化地理解和接受卫生知识。^⑤更为重要的是,卫生运动大会通过讲演和广播,宣传卫生事业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紧密关系。1934年第一次卫生运动大会,市长袁良指出要想摆脱“东亚病夫”的称号,实现国家富强,“就是要先强种……我们要人民健康起来,除了提倡卫生,没有旁的更好的办法”。^⑥此外,在广播中也多次强调卫生运动大会是“复兴民族的一种运动”。^⑦通过卫生运动大会的一系列活动,民众的卫生观念和民族意识都有所提高。在大会设置的批评簿中,“健种强国”、“强种之基”、“卫生救国”等民族意识浓厚的评语比比皆是。^⑧

最后,扩大了国家政权在基层的影响力及对公共事务的控制力。从某种程度上说,卫生运动大会可视为一场达到“卫生强国”政治目标的运动,表现出政府对公共卫生事业的积极态度。从开闭幕式秩序安排中,便可看出卫生运动大会具有浓厚的政治集会色彩,主要包括奏乐、全体肃立向党旗及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主席恭读总理遗嘱、静默三分钟、主席致词、市党部指导、市长训话等,而后才是讲演、歌舞等文艺表演。这种相对固定的仪式成为国家“展现和建构权威的权力技术”,将政治权力呈现为“一种合法合理的运用”。^⑨通过分区进行卫生运动大会,又将国家权力渗透到基层领域。同时,北平市政府充分利用中山公园等公共空间,借助卫生运动大会这一形式,对饮食店铺、澡堂浴池等消费场所进行严格管理和监督,有意识地教导和规训民众,彰显了国家对社会事务的控制力。从实际效果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是存在的。一方面,在统一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下,民众和社会团体更多地顺应国家政策,积极配合政府完成既定的卫生工作和防疫任务。另一方面,民众也积极回应,提出若干期许和建议,如“望当局继续努力”、“希望能普遍宣传”、“卫生展览应普及到农村去”等。^⑩

不可否认,卫生运动大会的连年举办,对北平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和政府权力强化都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下,卫生运动大会也显露出种种弊端。其一,推动公共卫生事业的现代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北平当局缺乏足够的估量。在市长袁良看来,卫生工作“要群策群力”,在政府方面应有专门机构实施卫生行政,个人方面“不过手足勤劳,就可免除疾病,增进健康”,并乐观估

①《本市将厉行全市清洁》,《北平特别市公安局政治训练部旬刊》1929年第17期,第17页。

②《清洁抽查》,《卫生月刊·第三届卫生运动大会专号》1936年第5、6期合刊,第21-23页。

③《卫生要闻:种痘运动已结束》,《卫生月刊·第二次卫生运动大会专号》1935年第8、9期合刊,第95页。

④《大会宣言》,《卫生月刊·第三届卫生运动大会专号》1936年第5、6期合刊,第5页。

⑤《会期经过暨闭幕志盛》,《卫生月刊·第二次卫生运动大会专号》1935年第8、9期合刊,第90-92页。

⑥苏病:《北平市第一次卫生运动大会袁市长演说词摘要》,《大公报》1934年5月22日,第11版。

⑦容启荣:《愿大家努力卫生的运动》,《卫生月刊·第二次卫生运动大会专号》1935年第8、9期合刊,第36-37页。

⑧《参观民众之批评》,《卫生月刊·第二次卫生运动大会专号》1935年第8、9期合刊,第92-94页。

⑨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页。

⑩《参观民众之批评》,《卫生月刊·第二次卫生运动大会专号》1935年第8、9期合刊,第92-94页。

计“使全市民都走向康健的大道，我想再有一年两年的改善，一定可做得到的”。^①但实际上，许多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依旧十分困苦，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遑论生计之外的事情。其二，卫生行政机构的经费、人员不足情况一直存在，或多或少地制约了国家权力的发挥。从卫生处到卫生局，北平卫生行政机构经费常入不敷出，“万分拮据”^②，导致相关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大打折扣，出现民众和社会团体抵制政府的状况。虽然卫生局屡次饬令各住户、商铺注意清洁卫生，但是仍有不少市民基于自身利益，将垃圾在附近街道或沟口处随意倾倒，使卫生员警和清道夫难以应付，极大地消耗了有限的人力和财力。

结语

在卫生运动大会中，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及成效充分体现出来，政府力量与个人利益的冲突和矛盾也不断浮现。北平市政府以主导者的身份，通过赋予公共空间新的内涵，采取多种手段，试图将国家权力和官方意识渗透到社会各阶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建构政府-社会团体-民众三方合作状态下的现代公共卫生体系，塑造具有卫生意识的“新人”。受制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因素，近代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进展履步为艰，任重道远。但在“强国强种”、“救亡图存”的民族思想凝聚下，政、商、学、医、军等社会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都积极参与卫生运动大会，并在短期内集中开展卫生宣传、防疫、竞赛、清洁等活动，普及了卫生常识，播散了新的生活观念，是一场历史意义重大的卫生教育实践。

Research on the Health Movement Conference in Beiping, Republic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te and Society

SONG Yong-lin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59,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public health industry in Beiping developed slowly. From 1934 to 1937,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cleaning campaigns, the Beiping Municipal Government organized four health campaign conferences. During this period, the government and relevant health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closely cooperated with various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carry out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such as health exhibitions, public opinion promotion, children's fitness competitions, cleaning and cleaning, and preventive injections, mobilizing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the general public. The holding of the Health Movement Conference has not only cultivated public awareness of hygiene to a certain extent, improved urban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nd promoted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health. Moreover, it reveals the multi-leve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odern state and society, reflecting the infiltration and control of state power over social affairs and the daily lives of the people.

Key word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state and society; Beiping; public health; health movement conference

[责任编辑 山阳]

①《袁市长训词》，《卫生月刊·第二次卫生运动大会专号》1935第8、9期合刊，第10-12页。

②苏病：《北平市第一次卫生运动大会袁市长演说词摘要》，《大公报》1934年5月22日，第11版。